悼蕭友梅先生

熊樂忱

民國十五年秋，我投考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時蕭友梅先生爲該系主任。主考普通樂理，我在試場第一次認識蕭先生，他身材高瘦，額部寬大，面容和藹而莊嚴，使人敬服。從此以後，我隨先生學習樂理及和聲學一年，寒暑假時，並承招至有寓義務補習。其教學的熱忱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于此可見一斑。

十六年秋，北京國立各大學併稱國立京師大學，藝術專科併入京師大學藝術專門部。當時教育當局下了解音樂教育，竟將該專音樂系停辦，致令莘莘學子備「流離失所」之痛，而先生目睹一手創辦的音樂系被人摧殘，更無限悲憤。同時國立女子大學併稱京師大學女子第二部，先生兼任該校音樂科主任，但深知處在此種環境之下，樂教前途絕難發展，於是毅然辭職赴滬，另謀發展樂教之途。

經先生數月奔走計劃，我國唯一首創的國立音樂院于十六年十一月成立于滬濱，蔡子民先生兼任院長，先生任教授兼教務主任。我正苦無適當學校可讀，聞此消息，乃立時買舟南下，承特准免試轉入該院，遂又得隨先生繼續所學。

音樂院創辦未久，蔡院長以事冗，由先生代理院長，是時學校雖因於經費，幾難維持，經先生獨力支撐，苦心經營，成業斐然，校譽日隆。先生尤富責任心，事無論大小，必親自過問，故整年暇日之時間均消磨於校內。十八年八月，國立音樂院改組爲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我于此時赴歐，入其皇家音樂院，從此與先生別。返國後，又以任數平津，此後竟未得與先生聚晤。

先生于民國九年由滬返國後，即以全力推動音樂教育事業，初于北京大學附設音樂補習所（最初名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繼于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設音樂科；再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附設音樂系，開我國專科以上學校設立樂專系之先例，造就中小學校音樂師資人才尤衆，爲我國音樂教育奠定一新基礎（是時與先生共同努力者尚有楊仲子，劉天華二先生），誠我國音樂史

上不可磨滅之偉蹟。後又創辦國立音樂院于上海，除造就音樂師資外，並致力於音樂專門人才之培植，國內音樂界同仁多出其門，我國音樂教育之有今日，先生實有莫大之功績。茲將先生傳略附錄于后。

（附註：『蕭友梅先生傳略』係承上海友人寄來，內容有一二點與事實略有出入，兩此申明。）

蕭友梅先生傳略

蕭先生友梅，字雪朋，一字思鶴，廣東中山人。幼從父讀居澳門十年，每聞比鄰葡萄牙人演奏西樂，輒心嚮往之。十六歲入廣州之時做學堂。十八歲，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東京高師附屬中學；並在東京音樂學校習鋼琴唱歌，得唱歌科畢業證書。中學畢業後，歸法政大學之高等預科，以廣東省官費生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習教育學（一九〇六年）並仍在東京音樂學校習鋼琴。時孫總理通遼東京，先生與共起居，偕聞革命緒論，遂加入同盟會。一九〇九年，畢業東京帝國文科學校。隔年，應留學生畢業考試，獲給文科舉人。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任總統府秘書（民國元年三月）。同年五月，任廣東教育司科長。十一月，由北京教育部派往德國留學，入萊比錫國立音樂院理論作曲科專攻音樂理論，並在同地國立大學哲學科研究教育。民國五年，得哲學博士學位。繼又轉入柏林大學及私立星氏音樂院研究。時歐戰力酣，道途梗阻，故延至民國九年始得返國。返國後，除在北京教育部供職外，先後任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及國立女子大學音樂科主任，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主任，國立北京大學講師等職。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奉大總統蔡子民先生之命，創辦國立音樂院于上海，蔡先生兼任院長，而由先生任教授兼教務主任并暫兼理事務主任。同時大總統聘爲專制教育委員會委員。十二月，蔡院長以事冗，特命先生代理國立音樂院院長。十七年三月

，大學院聘先生爲審查教科圖書委員會音樂圖畫手工圖編輯審查委員。九月，大學院聘先生爲國立音樂院院長。十八年五月，教育部聘爲編審處譯名委員會委員。八月國立音樂院改組爲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仍由先生任校長。廿二年五月，教育部聘爲幼稚園中小學音樂教材編訂委員會委員。二十四年十二月，考試院聘爲選委員會兼任專門委員。二十六年一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文化事業指導委員會聘爲音樂研究會專門委員。三月，教育部內政部聘爲音樂典編訂委員會委員。二十九年五月，教育部聘爲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綜先生主持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先後凡十

三年又二月，對音樂教育，苦心經營，不遺餘力。○比以環境惡劣應付不易，積憂成疾，竟致不起。先生生於一八八四年一月七日，歿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卅一日，妻戚粹真女士，遺孤二：男勤，年六歲；女雪真，年四歲。先生一生廉介，束脩所入，不敷開支，以是身。蕭條，令人。嗚。所著有『普通樂學』，『和聲學』，『曲體學』，『春江花月夜』，『霓裳羽衣舞曲』，『鋼琴教科書』，『風琴教科書』，『小提琴教科書』，及德文『中國古代樂器考』。與吳章濤先生合著者，有『楊花』，『今樂初集』，『新歌初集』，『新製制唱歌教科書』。

音樂上的國別化與國際化運動 劉焜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在音樂上發生了兩種不同的思潮，即音樂的國別化與國際化運動是。前者極力提倡各民族間互異的音樂特質，注重本國民歌俗樂的發展，建立與世不同的國民音樂；後者努力排除各民族間音樂上的隔膜，並博引旁徵，融合各派音樂的精華，想創立一種通行世界的最理想的音樂。以前一派的勢力較大，影響所及，僻處遠東的中國亦多其激動。

音樂的進展，自古以來，帶了種族與國別的差異。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國家，因了語言人種，傳統習俗，地理環境及其他政治上經濟上各方面的差別，自然在音樂上會顯出不同的傾向，不同的特質，如採用本國特有的音階或調式，喜歡合乎自己特性的曲體，愛用本國特有的樂器等，以及各方面雖大有進步變遷，但這種種族上的差異永未減退，永未消滅，到了十九世紀，更有音樂國別化的具體行動出現，風聲所播，世界騷然，而特別以挪威，芬蘭等北歐小國及俄羅斯等富保守性的東歐國行動爲積極。各國音樂家抓住了本國音樂的特色，盡量使之發揚光大，以樹立本國國民音樂的基礎。

北歐有幾個小國，如瑞典，挪威，與芬蘭是。這帶地方苦寒嚴當，人民經常生活的威脅之中，除少數的特例之外，他們在世界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據重要的位置。這些小國，在

音樂上歷來受德國的支配，拾其牙慧，仰其鼻息而已。十九世紀末，愛國主義風起，民族自決的口號響遍了整個的世界，這些小國的音樂家大受激動，不甘外國樂派的長久統治，奮起努力，研究固有的民間音樂，獎本國的作曲家與演奏家，創立高等的教育機關與演奏機關，以求建立本國的國民音樂。這幾個小國中鬧得響亮的而最有成效的要算挪威與芬蘭，而以格利格（Grieg）（一八四三——一九〇七）與西培利烏斯（Sibelius）（一八六五——）爲代表人物。

東歐的俄羅斯，在十九世紀以前對音樂方面的建樹甚少，迨至十九世紀末才有了驚人的進展。一八六〇年等俄國在音樂上的突飛猛進，更爲歷史上罕見的奇蹟。其原因，一半由於德國的刺激，一半由於斯拉夫民歌豐富的寶藏經過了幾世紀的孕育而終於放出了異樣的光彩。俄國努力國別化運動的作家，有所謂「五人團」，普羅丁（Borodin）（一八三四——一八八七）即伊（Cui）（一八三五——一九一八），談索格斯基（Musorgsky）（一八三九——一八八一），巴拉基里夫（Balakrev）（一八三六——一九一〇）及利摩斯基。科薩科夫（Rimsky-Korsakov）（一八四四——一九〇八）是；五人相輔而行，使俄國的國民音樂放出了異樣的光彩。